

### (二) 孟诜

生于唐武德四年(621年),卒于开元元年(713年),汝州梁县(今河南临汝)人。曾举进士,官至光禄大夫。居官时以治著称。少好医药,曾师事孙思邈,长于饮食疗法和养生。晚年(80余岁时)归伊阳山,以研究方药和食疗为事。著有《必效方》、《补养方》;后者经开元间道士而兼通医者张鼎改编增补而成《食疗本草》。孟诜尝语人曰:“善养性者,善言不可离口,善药不可离手。”

### (三) 陈藏器

8世纪唐代四明(今浙江鄞县)人,生卒年代不详。开元年间(713—741年)任京兆府三原县尉,精本草学。鉴于《新修本草》在内容上还有许多遗漏和错误,有必要进行补充、整理和编辑。为此,陈藏器便深入民间进行调查,同时搜集经史百家等文献资料,以补充《新修本草》遗漏药物为主撰成《本草拾遗》,大大扩充了用药的品种。而且该书对药理学理论和用药实际、资料汇编和药品考订都能兼而顾之。因此,明代著名本草学家李时珍对他大加推崇,认为“其所著述,博及群书,精核物类,绳订谬误,搜罗幽隐,自本草以来,一人而已。”

### (四) 李珣

字德润,9世纪末10世纪初唐末五代时梓州(今四川三台)人。祖籍波斯,其家以经营香药为业。香药主要通过海舶从国外输入,故又称海药,也有部分药物移植于中国岭南一带。他曾广游岭南,知晓南国乡土风物,熟悉南方药用动植物。李珣善辞章,为蜀后主所重。因政局动荡,忧愤畏讥,政治上不很得意。晚年隐居,接近道家,好摄养、炼丹。今存其词多述南方动植物。所著《海药本草》记载了大量外来药及一些炼丹内容。

## 四、药事制度与药学教育

### (一) 药事制度

隋初设置门下省统尚药局,主管药政;设太常寺统太医署,主管医政。隋炀帝时则分门下省为殿内省,统尚药局,设奉御、直长、司药佐员等;太医署另设药藏局监、药藏局丞等。唐代沿袭隋制,以殿中省统尚药局,设有奉御2人,直长4人,主药2人,药童30人;太常寺统太医署,有主药8人,药童24人,药园师2人,药园生8人,典药1人等。这些设置与人员主要服务于宫廷。

公共医药卫生在唐代颇受重视,朝廷除办“养病坊”收容穷苦病患者和每年给药以防治民众的疾病以外,还曾多次明令郡县张标牌版公布切要方药于村坊要路,普及宣传医药卫生,方便百姓防病疗疾。

唐代又制定了药政管理律令。如《唐律》载有“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者绞”,“料理拣不精者,徒一年。未进者减一等,监与官司各减罪一等”;“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,徒二年半”。至于“诸以毒药毒人及卖者”,均处以绞刑。这些严格的医药律令和以毒药犯罪的严厉刑罚,对保障药品质量,提高加工技术及安定民生都有积极效应。

### (二) 药学教育

隋唐时代医药教育事业进步显著。隋代设太医署,唐代更加扩大和完善。其药学教育部分专在京师设置药园,面积三顷地,属药学校和制药作坊性质。招收16~20岁的民家子弟为药园生,学习本草,掌握药物产地、性状、种类、栽培、采集、贮藏加工以及配伍禁忌等知识,从中选拔药园师。这是我国培养药学专业人才的开端,也促进了本草学的发展。

## 五、药材贸易

隋唐时期延续了历代王朝的土贡政策。各地特产每年进贡

朝廷。836年唐户部侍郎李石建议:“诸道除药物、口味、茶果外,不得进献。”药材成为主要贡品之一,每年各地土贡的当地药材达142种之多(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)。这就保证了京师的医疗用药。

就全国来说,隋唐时期发展了药材贸易,其途径有三:

### (一) 药行、药肆售药

唐代城市中工商行业种类很多,如西京(长安)的东西两市,各有220行;东京(洛阳)有120行,商铺3000余肆。药行便是其中之一。

唐代的药行贸易较土贡政策对经济发展有更大的促进作用,但仍未脱离相沿已久的古代型商业“日中为市”的遗风。加之国家对市场的管理也很严格,除两京外,非州县不得设市(《唐会要》八十六)。因此没能形成左右全国的大型药行。不过由于唐代水陆交通十分发达,各道陆驿1291所,水驿1330所(《唐会要》六十一),每个驿所往往都成为各地商货聚集的地点,药行贸易依然十分活跃,是药材贸易的主要支柱。

### (二) “药市”贸易

据载,唐大中十三年(859年)九月九日在四川梓州开始出现药市(宋代高承《事物纪原·岁时风俗部·药市》)。每年于九月初,天下卖药者,都云集梓州城,进行药材贸易。这种药市不受州县制约,同全国各地各种形式的“草市”、“村市”、“墟市”、“蚕市”等一样,是可以自由存在于广大农村中的定期市。从此拉开了药物集市自由贸易的序幕。如咸通四年(863年)“闻溪洞之间,悉藉岭北茶药,宜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,不得禁止往来。廉州珠池,与人共利。”(《旧唐书·懿宗纪》)可见这种互利的药材贸易,还发展到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互市。

### (三) 边区互市、市舶贸易

唐代对外药材贸易,也开始大量发展起来。陆上主要是通过边区互市与周边各族(国)交换药材。唐代郑虔《胡本草》所收集的域外药物大部分来自边境贸易。海上药材贸易也十分活跃,临海“市舶”即始于唐开元年间(713—741年)。当时主要通过大食(阿拉伯)人将南海诸国、印度、波斯、大食所盛产的药材,经广州、交州、扬州、泉州、福州、明州、温州等地市舶输入内地,同时将“神州上药”运销阿拉伯、印支乃至地中海沿岸地区。据记载到8世纪末,唐代市舶之盛每年进港达4000余舶。

唐代药理学教育与药材贸易的发展,刺激了广大农民、药农的商品意识,促进了药材生产。一方面国家培养药园师,掌管种药与采收,并派往各州采办药材;另一方面,民间的种药知识和技术,也随着药材贸易的兴旺和农书的传播而不断提高。

## 六、中外药学交流

隋唐的统一,经济文化的发展,使中外医药交流也随着交通的发达而日益频繁,《新修本草》、《胡本草》、《海药本草》对外来药的记载,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。此外,还可以从隋唐的大型方书和史料笔录中窥见与各国交流之大略。

中国医学与朝鲜医学属同一体系,至今朝鲜固有医学亦称“东医”。中国文化对朝鲜影响较大的时期是在唐代。当时朝鲜正处于新罗统治时期(669—935年),不断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医,同时朝鲜医方也流入中土,治脚气病的高丽老师方也早被中国医家采用。692年孝宗王时,设“药典”为宫廷医疗机构,置博士2人,教授中国医学,教材有《本经》、《素问》、《难经》等,学制仿唐。朝鲜药物很早就传入我国,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已收有若干种,唐代苏敬、甄权、陈藏器、李珣诸人所著本草中,记载了朝鲜产的白附子、海松子、延胡索、蓝藤根、担罗、海藻等。此外,朝鲜人参、昆布、牛黄、芝草等药的输入也常见于史书中。

中越两国医药交流汉魏以来始终不断,到唐代,兼通医药的